

# 江村经济

JIANGCUN JINGJI QISHINIAN

## 七十年

周拥平◎著



版  
社

# 江村经济七十年

周拥平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村经济七十年/周拥平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1118-008-1

I. 江... II. 周... III. 农村经济—调查研究—吴江市 IV. F3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6651 号

责任编辑: 姚铁军 封面设计: 王春杰

策划: 张荣华、费宗惠

摄影: 周拥平(注明的除外)

## 江村经济七十年

周拥平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1.75 字数 210 千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7-81118-008-1/C·063 定价: 22.00 元

## 前言：费孝通开创的江村研究

有这么一个村子，如果你想了解某人是否具有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背景，你只须问他知不知道这个村子，如果回答说知道，他也许是社会学人类学中人，也许只是偶尔涉及这一领域，而如果说不知道，那他肯定与社会学人类学完全无缘——这个村子，就是开弦弓村。人类学名著《江村经济》描述的“江村”就是开弦弓村。

开弦弓村，太湖东南畔、江南鱼米之乡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因为一个不平凡的人而不再普通。这个不平凡的人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泰斗、已故的费孝通教授(1910—2005)。1936年的七八月间，年轻的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费孝通祖籍江苏吴江的同里镇，这是一个富庶、优雅的小镇，现在是江南古镇旅游的热点之一。费孝通的出身地不是同里，他出身时费家已迁到吴江的另一名镇——松陵镇的富家桥弄。现在的吴江市就是在松陵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开弦弓村所属的震泽镇(区)也是吴江治下的一个重镇。两地相距四十来公里，人们所操方言大体一致，生活习俗大致相同，所以费孝通在村里走家串户就没有太多语言和文化上的隔阂，他可以随意地与村民交谈，了解村民们的家计与社会生活。村民们则亲切地叫费孝通“小先生”。

为什么村民们称呼费孝通“小先生”？是因为村里还活动着一位大家更熟悉的“费先生”——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1903—2005)。费孝通之所以能在村里如鱼得水般地进行社会调查，除了语言相通(但并不是彼此说话都能完全听懂<sup>①</sup>)和他本人的平易近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费达生在村里开展的事业，得益于她在村里的“人脉”。费达生14岁就进入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学习，17岁毕业就被学校选派去日本留学，第二年考入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学习。1923年夏天，费达生从日本回到母校，加入女子蚕业学校新成立的蚕业推广部，投身于校长郑辟疆开辟的向农村推广改良蚕种及科学养蚕技术的事业。郑校长带领推广人员，带着桑苗、

---

<sup>①</sup>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潘乃谷等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蚕种、蚕具、蚕茧、丝车等实物和有关的模型、图表，到吴江县各乡镇巡回宣传科学养蚕。1924年，费达生和女子蚕业学校蚕业推广部的同仁在开弦弓村建立蚕业指导所，并组织21户村民成立蚕业合作社。1925年费达生接任女子蚕校推广部主任，她继续带领推广部人员到开弦弓村指导养蚕，并把合作社扩大到120户。<sup>①</sup>1929年她又在开弦弓村组织蚕农入股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使得传统的单门独户经营的、作为农村副业的蚕丝业向企业化运作的形态过渡。费达生还介绍村里一批年轻妇女到苏州等地的缫丝厂工作，她们赚来的工资可以贴补家用，<sup>②</sup>同时也扩大了她们与外界的接触，丰富了她们的生活内容。费达生所做的一切对开弦弓的村民们意义重大。开弦弓村人多地少，蚕桑是维持生计的重要副业。费达生的努力提高了村民们养蚕的技术，蚕丝的质量好了，产量高了，卖的价格也高了，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费达生与村民们的友谊也与日俱增。村里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至今提起费达生还是充满感激与崇敬之情。

1936年的夏天，费孝通白天挨家挨户做调查，晚上就睡在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宿舍里。农村需要发展工业、需要先进技术思想，一定是从那时起就开始在费孝通的脑海里形成的。调查结束，费孝通远渡重洋，负笈英伦，到著名的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在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费孝通用在开弦弓村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写成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获得通过的当晚，马林诺斯基就把它推荐给英国的Routledge书局出版，并预言该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书局建议把书名改为《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还在书的扉页印上了中文书名《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中译本直到1986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取《江村经济》。从此，江村就成了开弦弓村的学名，随着《江村经济》的一版再版，江村或开弦弓村的知名度不断上升，在社会学人类学学子的心目中，江村已是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圣地”。

费孝通在中文版《江村经济》的著者前言中说，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的写成“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我们可以说，没有费孝通就没有《江村经济》，没有马林诺斯基就没有《江村经济》；我们也应该说，没有费达生就没有《江村经济》，没有费达生的社会实践，就没有费孝通的学术实践。

费孝通1938年初秋离英回国，在云南农村继续开展农村调查，Peasant Life in China则于1939年出版。此时二战正酣，全球社会一片混乱，所以费孝通直到

<sup>①</sup> 曹鄂、余广彤：《费达生概况》，<http://www.jiangcun.com.cn/qiyefc-f.htm>。

<sup>②</sup> 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4—165页。

二战结束才收到书局寄给他的这本书。在这期间，费孝通也好，开弦弓的村民们也好，大概都不会想到，他和他们，费孝通和开弦弓，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偶然因素促成的”《江村经济》会成为社会学人类学实地调查的经典之作，开弦弓会源源不断地吸引国内外的学者、学子前来考察、研究或者——“朝圣”。

1956年5月，在费孝通江村调查的二十年后（如果把费孝通首次调查开弦弓的1936年定为江村调查元年，则此时是江村调查二十年），村民们迎来了研究开弦弓的第一位国外学者（他也是村民们见到的第一个欧洲人），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威廉·格迪斯（W. R. Geddes）博士，他是费孝通的伦敦经济学院老同学。格迪斯博士读过《江村经济》，而且在讲授人类学课程时一直把这本书作为指定参考书。他也许早就有访问开弦弓的念头，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的动荡岁月里，一个西方学者想要深入中国农村几乎不可能（虽然1938年至1949年期间仍有个别西方人类学者来中国做研究或讲学<sup>①</sup>）。这次他是随澳大利亚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顺便提出访问开弦弓的要求。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小事一桩，但在当时，却是要经过国务院总理的特批，格迪斯博士才得以对开弦弓村进行了四天的实地调查，成为开江村再调查风气之先的第一人。格迪斯博士回国后直到1963年才出版了他的江村调查报告 *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以呼应费孝通的 *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格迪斯在书的引言中说，像《中国农民的生活》“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把 *Peasa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与 *Peasant Life in China* 放到一起，其学术价值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受格迪斯再调查江村的启发，费孝通于1957年（江村调查二十一年）率调查组在江村调查二十天。费达生作为江苏省人大代表，陪同费孝通一起进村。姐弟俩与众乡亲们阔别多年后再次重逢，彼此都很激动，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费孝通很快就发现欢乐气氛背后村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缺粮缺钱！虽然当时的环境只宜于歌功颂德，费孝通还是忍不住用委婉的笔调把在开弦弓的所见所闻条分缕析地写出来，在《新观察》上连载《重访江村》。报告还没连载完，政治舞台已风云突变，费孝通被打成右派。他对开弦弓的再研究戛然而止，一班人马调查来的大量资料在以后动乱的岁月里大部分失散，一部分由吴江县政府保

<sup>①</sup> 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潘乃谷等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11页。

存下来。<sup>①</sup>

对江村的研究停止了,这一停就又是二十多年,直到1981年(江村调查四十五年)10月,费孝通才偕姐姐费达生三访江村。有意思的是,和二访江村一样,在费孝通去之前,有外国学者先行探路:当年的9月下旬,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常务理事、美国农业发展委员会亚洲组主席、马里兰州立大学副校长、社会人类学教授南希·冈萨雷斯女士应中国科协邀请,访问了开弦弓村。这兴许只是巧合,但也可能体现了中国政治生态的某种特质。费孝通三访江村的成果,是在伦敦接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赫胥黎纪念奖章”时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题目就是《三访江村》。他说:“这次短短的几天访问,由于激动人心的巨大进步以及令人陶醉的家乡情谊,使我担心我的观察是否会超越了科学的界限。”他还说:“我觉得特别高兴的是在这里看到了我几十年所想像的目标已在现实中出现,而且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显露了苗头。”据当时陪同费孝通访问开弦弓的吴江老县长于孟达回忆,从三访江村起,费孝通以后每次来江村他都陪同,而三访那次确实是费孝通最兴奋、最高兴的一次。

再往后的二十多年,可能是中国历史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段经济发展时期,学者学子们对江村的调查研究也进入了与太平盛世相应的全盛时期。仅费孝通本人访问江村就达二十多次(笔者参与了1986年费孝通对江村的第十一次访问,参加该次考察的还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中根千枝,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巴乃特)。1986年(江村调查五十年)前,费孝通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沈关宝(现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对江村进行了连续几年的实地调查,写出博士论文《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1986年6月,费孝通随胡耀邦访问西欧时,在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作了题为《江村五十年》的演讲,他回顾江村半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后说:“历史的巨轮是不会停止的。上述的江村在过去五十年中的变化,很可能是更大更富有意义的变化的前奏。”1996年(江村调查六十年),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为纪念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60周年(费孝通的学术活动就是起步于1936年的瑶山调查和随后的江村调查的),出版了《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纪念文集,其中与江村有关的文章有:费孝通的《重读〈江村经济·序言〉》、沈关宝的《解放前的江村经济与土地改革》、惠海鸣的《从土改到合作化的江村》、刘豪兴<sup>②</sup>的

<sup>①</sup> 惠海鸣(费孝通教授的1987级博士研究生):《从土改到合作化的江村》,载潘乃谷等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2页。

<sup>②</sup> 刘豪兴: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农工之间——江村副业 60 年的调查》和李友梅<sup>①</sup>的《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的讲话中曾经许下一个愿，他说：“到那时候（1986 年）即使我不能再在这个讲台上做一次补充演讲，希望一本《江村经济》的续篇可以在那个时候送到在座的朋友们的手上。我这个希望的根据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在我出发来伦敦之前已经作出决定，将在开弦弓村建立一个社会调查基地，一个可以进行继续不断地观察的社会科学实验室。如果这个社会调查基地能顺利地建成，通过年轻的研究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我相信刚才许下的意愿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开弦弓村作为社会考察的基地和社会科学的动态的实验室已经是学界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撰写《江村经济》续篇的行列中。沈关宝在《一场悄悄的革命——苏南乡村的工业与社会》的导言中就明确表示：“本书是对江村作追踪研究的一部份。”笔者从 2005 年（江村调查六十九年）的 2 月至 2006 年（江村调查七十年）的 3 月，共访问开弦弓村 31 次，进行了间断性的连续实地调查。在吴江市政府和老县长于孟达的支持下笔者还牵头组织了一个“江村七十年调查”的课题组，课题组成员有朱云云、姚富坤、周荣根、周全奎、吕金根、倪敏锋和倪正卿，除了朱云云是吴江市人大的干部，其余各位都是开弦弓村本地人。费孝通二访江村时就住在周荣根的父亲周文昌家里（那时周荣根还没有出生）。课题组成员或多或少都参与了访谈工作。本书依据调查资料和有关文献写成，我们希望本书也能成为《江村经济》的续篇之一，为费孝通先生开创的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江村研究事业添上一块砖。

---

<sup>①</sup> 李友梅：上海大学教授、副校长。





美丽的开弦弓——今日江村。



课题组成员：（左起）周全奎、周荣根、朱云云、周拥平、姚福坤、倪正卿、吕金根、倪敏锋。

# 目 录

前言：费孝通开创的江村研究 .....	1
一、引子：一个传奇式家庭的今昔 .....	1
二、区位：开弦弓的交通及周边环境 .....	14
三、蚕桑：古老行业的世纪轮回 .....	32
四、螃蟹：传统副业的市场理性 .....	54
五、羊毛衫：市场魔力催生的庞大产业 .....	72
六、丝织厂：现代企业的萌芽 .....	90
七、水乡风情：换个角度看江村 .....	111
八、和谐社区：永远的家园 .....	124
九、理性社会：面向未来的历史反思 .....	143
十、世事沧桑：江村人心目中的江村经济 .....	154
后记：心存永远的感激 .....	173
参考文献 .....	177

## 一、引子：一个传奇式家庭的今昔

开弦弓已经建起了很多乡村别墅，夹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造的楼房之间。村里还有一些平房，大多有上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这些为数不多的老式平房成为楼房和别墅的点缀，就像城里有点品位的人家客厅里摆放几件老旧家具。每栋别墅的造价不尽相同，一般从十几万到四五十万。四五十万的别墅可以盖得很大很考究，虽然其中的厨房和卫生间大多不够精致，按大城市考究人家的眼光看还未必尽如人意。

如果你走进这些别墅，坐下来一边喝着主人奉上的熏豆茶——这一带农村特有的沏茶方式：略带咸味的熏毛豆和绿茶沏在一起，还可以撒上一点芝麻，或者再加一点胡萝卜干丝，喝茶则成了连吃带喝，不但喝下茶水，而且把熏毛豆什么的连茶叶都吃下去——一边与主人慢慢地说话聊天，你会发现每栋别墅后面都有一段故事，那是别墅的主人们或平凡、或离奇，或顺利、或曲折，或简单、或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奋斗过程。尽管主人的叙述或许很平和，甚至轻描淡写，但也常常会令你唏嘘不已，感慨良久。

村子东头的一栋别墅与众不同，更高更大，有气派的大铁门，有宽阔讲究的院子，造价据说近一百万，创下开弦弓村农民别墅造价之最；别墅后面的故事更是具有传奇色彩，我曾把它讲给许多人听，听者无不啧啧称奇。而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不是这别墅的庞大与豪华，也不是别墅主人创业经历的曲折与传奇，而是这个家庭的特殊结构。

2005年2月中旬的一天，复旦大学的刘豪兴教授陪我在村里转了一圈。刘教授从1982年起每年春节都要到村里住上几天，平时还经常带学生来考察，所以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他把我领进那栋与众不同的别墅。别墅有三层，底下两层装修得很好。每层有两个卫生间，其中一间甚至有冲浪浴缸，但室内很冷，估计冬天没法洗澡。那天别墅的主人周耀明不在家，偌大一栋楼只有一位老太太住。老太太今年72岁，说她的儿子周耀明在上海做生意，媳妇和孙子这时也在上海。老太

太不知道儿子的上海电话，她说知道也没用，不会打电话，有事的话让亲戚代打。

过了十来天，我第二次走进周耀明的别墅。除了周耀明，全家其他三位都在。我们坐在院子西南角的厨房里吃茶说话。别墅虽然很大，每层有二百平米左右，但是没有厨房和餐厅。在院子的西南角另外单盖两间平房，一间做储藏室，一间做厨房兼餐厅。别墅堪称“豪华”，厨房却很普通，和村里大多数人家没什么两样：一个烧稻草的传统灶头，白粉底上描着彩画（我曾看过一篇小说，描写江南小镇上的中学美术教师周末下乡，给农家的灶头描画，可赚一顿好吃好喝和不菲的酬金）；一个烧煤气罐的煤气灶；一张圆桌和几个凳子。可见他们虽然有钱盖好房子了，但生活习惯并没有多大改变，远没到讲究生活细节的地步。<sup>①</sup>周耀明的妻子也姓周，叫周建美，看上去三十多岁。他们的儿子读小学六年级，有点调皮，撺掇我动员他妈妈给他买电脑。我们随意地说着话，不知怎么说到老太太不但是周建美的婆婆，还是母亲；而周建美不仅是老太太的儿媳妇，也是亲生女儿。这差点要把我弄糊涂了，难道周耀明不是老太太的儿子？小孩不是明明叫老太太奶奶？最后总算搞明白了，原来周耀明是老太太的养子，周耀明和周建美起先是兄妹相称，后来才成为夫妻。因为周耀明的身份是养子而不是入赘女婿，所以周建美的身份只能由女儿变成“儿媳妇”，顺理成章地他俩的儿子是老太太的“孙子”而不是外孙。

这一段变故说起来话长。老太太叫周四宝（这一带姓周的很多，是我所到过的我的同姓人最密集的小区），二十多岁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西边临近浙江的八都一带农村嫁到开弦弓。嫁过来不久就遭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很艰难。直到三十多岁（1966年）才有孩子，可是孩子很快夭折。悲痛中的周四宝夫妇以为两人岁数已大，今后可能不会再生育孩子，就领养了邻村一个刚出生三个月的孩子，那孩子就是周耀明。周四宝用曾喂过亲生孩子的奶接着喂周耀明。五年后，周四宝夫妇又有了自己亲生的孩子，女儿周建美。按理说，这一家人有儿有女，应该十分幸福美满，可是周四宝回忆起以前的岁月，总是念叨着过日子的不易，虽然语调平静、神态祥和，但长年的贫困和伴随的痛苦似乎已深入骨髓，眼前的富足并不能抹掉满脸的沧桑。

周四宝出生于1933年，对“东洋人”（这一带的老人都这样指称日本人）进村还有点模糊的印象。她记得妈妈搂着她，“东洋人”在抢值钱的东西、抢鸡和鸭。她还记得“东洋人”来了以后，她出去讨过饭。不过经我们详细询问，得知她出去讨饭是

<sup>①</sup> 2006年的3月16日我又去看望周家老太太，离上次拜访他们相隔半年左右，发现厨房和餐厅完全变样了，烧稻草的灶头没有了，完全是现代城市高档住宅的装修方式。我一方面欣赏他们生活品位的提高，一方面也有点惋惜传统文化的没落。

在结婚以后，而她结婚时已经二十多岁，由此可推断讨饭是在1960年前后，也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看来“东洋人”抢东西和外出讨饭是她一生中经历的最痛苦、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在心灵深处这两件不好的事产生了某种关联。

周四宝记得，她的讨饭生涯前前后后有一年多。她利用养蚕的间隙，与年龄相仿的妇女们结伴去浙江的桐乡一带讨饭。她们带着被子，天不亮就乘船赶到汽车站，搭乘早班车出去。每次出去一般在外流浪十几天，不管春夏秋冬，晚上就睡在人家的屋檐下。不小心生病了，就挺一挺，从不去医院看病。她们虽然艰辛，却多多少少总有一点收获，除了自己有食物果腹，还能给家人带回一点山芋干，<sup>①</sup>不过钱是讨不到的。“刚开始讨饭时，有点难为情，”她说，“后来就习惯了。”周四宝的母亲因为始终不愿出去讨饭，靠吃杂粮维持，最后因营养严重不良和大便板结而不幸去世。周四宝靠讨来的食物维持了自己和丈夫的生命，却再没能力去帮一帮娘家。我惊讶于周四宝叙述这一切应该是不堪回首的往事时的平静，我不忍心追问她当时得知母亲饿死后是怎样的心情，而宁可相信时间能医治人类心灵的一切创伤。

周四宝和她的丈夫度过了难关，但生活还是不富裕，有了两个孩子后经济上更是捉襟见肘。到周建美18岁的时候，周四宝不得不跟她商量，因为家里穷，没有钱为周耀明娶别人家的姑娘成亲，只好把她许配给周耀明。懂事的周建美答应了。

我问过周建美，你从小是把周耀明当哥哥的，长大后他却成为你的丈夫，这感情上是怎么转的弯？这个话题我提起过几次，但始终未能让周建美谈出她的“心路历程”。她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她从小就知道周耀明有“娘家”（这等于明示了周耀明不是她的亲哥哥），而且这样的婚配在这一带一直是有的。显然，周建美答应母亲的要求并不困难。

很快地几年过去了，原来的兄妹该结婚成夫妻了。家里固然不富裕，但结婚时的尴尬仍出乎意料，婚礼上的一点喜庆气氛被上门讨债的债主们冲得一干二净。周建美回忆：

“九三年吧，耀明已是二十七岁了，我是二十二岁，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但在没有什么钱来办婚事。结婚前房间里自己添置的只有一件东西，是一张席梦思床垫，还几次差一点被横扇镇大家港一位债主拿走，是我父母苦苦哀求才勉强留下的。结婚时房间里所有的家具差不多都是耀明娘家帮助添置的，勉勉强强才办的婚事。结婚那天下午，我们还没有打开亲戚、朋友送来的红包，就有许多人上门来讨债了。虽然结婚是人生一大喜事，但那天看着这么多讨债的人早早地围坐着，我

<sup>①</sup> 据吴江老县长于孟达回忆，当时江苏的粮食征购任务重，把山芋都折算成粮食，而浙江那边粮食较富裕，山芋是不算粮食的。

心里根本高兴不起来。就这么一点红包钱，也还不了几个债主。那天的红包钱大多数是还给了横扇镇大家港的债主。好几个债主还是空着手回去的。想想当时的事情，真是有点心酸。”

开弦弓也和其他地方农村一样，再不富裕，结婚时婚礼总是要办的，婚宴总是免不了的，参加婚礼的亲友红包总是要带的，新婚夫妇收到的红包喜钱总是要大于婚礼支出的，这差额就是社会对一个新家庭诞生的资助。可债主们冲着红包来讨债的事并不多见，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周耀明、周建美这对从兄妹到夫妻的新人身上？

原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年轻的周耀明就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期望为他们将要建立的新家庭奠定经济基础。然而面对不规范的市场，缺乏市场经验的周耀明屡屡受挫，不仅没赚到钱，反而在欠下很多债务的境况中与周建美勉强成婚。而屡屡讨而不得，近乎绝望的债主们也就顾不得人情世故，在别人大喜的日子上门逼债，因为他们知道小两口多多少少总能收进几个红包，此时不讨，更待何时？

周耀明从小没有好好读书，不识几个字，但学得了木匠手艺，18岁时就去上海的建筑工地打过工，后来他的创业也自然从木业加工开始。他接到的第一张订单来自苏州，对方要求定做一批写字台(办公桌)。他租用当时生产队的仓库作为加工基地，找人借了一点款，买了很多材料，请了几个外地木工，以计件制的方式，做了一批写字台。结果这批货送到苏州后，对方以生产质量不合格为理由，迟迟不肯付款。稍微付一点钱后，又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讨了好几年也讨不到，托了苏州的熟人去讨也不行，即使后来打官司也没有什么结果，因为当时双方草草写下的合同行文不严密，难于追究对方的责任。第一次业务的失败，使周耀明赔了不少钱，为了购进原材料向别人贷的钱就不能如期归还，就连外地来的木工、油漆工都成了他的债主。

后来周耀明又在上海一个山东籍包工头的手里接到一宗业务，是定做一大批门框。包工头的施工队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了工程承包协议，包工头再把一部分加工门框的业务转包给周耀明。他俩之间只是签一个简单的个人协议，包工头按照当时的行规付给周耀明百分之三十预付款。周耀明用预付款做流动资金，开始组织生产。他又租用开弦弓中学(现已撤销)的校舍作为加工车间，又雇了几个外地木工，并请上了自己的师傅、师兄为帮手，添置了木工刨床等机械设备，开始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生产。刚开始的半年里，生产、送货、结帐还比较正常，但好景不长，弄到结果又是一场灾难。这边还在紧张地加工生产，那边施工队包工头项目做到一半竟然卷款逃跑了，周耀明又有一批货款(五十多万元)无从追讨。经过这两回

折腾，周耀明背了一身的债，达十七八万元之多（那时候开弦弓村人均年收入是两千多元）。不仅负债，还“弄得朋友分了手，亲戚断了门”。（周四宝语。）周建美对那时的窘境记忆犹新：

“那次给上海一家房产开发公司加工门框，结果亏了十几万元钱后，耀明在家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总觉得这不是办法。亏了这么多钱，讨债的人三天里头两天总有人上门。为了躲债，耀明常常要到半夜里回家，有时半夜要回家了，但看到家里的灯还亮着，就只能在外面再躲躲。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我父母辛辛苦苦挣来的几百元养蚕的钱，为了还急债，都只好拿出来垫上了。过年了，家里讨债的人更多了，连吃年夜饭了，还有人围着桌子旁在讨债。”

周建美回忆，为了躲债，也为了赚钱还债，就在他们夫妇结婚的第二年（1994年）秋天，他们设法凑了不足两千块钱，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开始闯荡大上海。他们来到上海西南近郊莘庄镇的一个村子，租了两间店面，开了一家建材小五金商店。现在的莘庄很繁华，当时还是一片郊区模样，所以店面的租金还算便宜。夫妇俩分工明确，一人主外一人主内。周耀明在外面跑生意、进货，周建美看店、卖货。周耀明从浙江南浔建材市场采购货物，运到上海的小店出售，赚一点地区差价。周建美说：

“那两年生意应该说还可以，但除了赚出每年一万二千元的房租金，加上水电费，再加上两人的吃用开销，两年下来一算，也没有多余什么钱。照这样下去，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欠下的十几万元债还清呢？当时耀明在外已经跑了几年，外面也结识了几个朋友，大家觉得耀明本来就是木工出身，根据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情况，还是重操旧业为好。结果把五金小商店转让给了别人，耀明的一位热心朋友，房产公司的，给了耀明第一批业务。耀明租下了几间农村集体的仓库，又叫了几个外地木工，再一次干起了加工房产门框的业务。刚开始的一二年里，业务是比较多的，也有一定的利润，但那两年的利润耀明几乎全部用在结识朋友的开销上。直到第三年开始，外面的朋友熟了，路子也宽了，才慢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前前后后，在上海闯荡了六七年，总算把亏下的十几万元债全还了，也终于过上了安稳体面的生活。”

我对周建美的回忆有所疑惑，第一，不到两千元的资金如何开起一家小店，又要付店面的租金，又要安顿三个人的生活，还要有流动资金去进货，这点钱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但在当时那么多人逼债的情况下，我相信他们确实不可能带更多的钱去上海；第二，如果开五金小店没赚到钱，周耀明如何能重操旧业，而且是在上海这个什么都要钱的地方建立木业加工车间。直到2005年的12月上旬，我有机会在

周耀明商务应酬的百忙之中与他长谈一次,才得以释疑。周耀明说,开五金小店的本钱共三万元,全是他的一个朋友拿出来的,他们带出来的一千七百元,仅够安置生活(这还差不多),但朋友只投资,跑业务的辛苦事全由他来做。当时生意比较好做,人们对价格不敏感,地区差价很大。比如一个螺钉在南浔买来只要四厘,到了上海就能卖一分二厘,百分之二百的毛利。而且他们直接卖到工地,量比较大,这是利润的主要来源,小店零售确实只够维持店面的开销。到1994年年底,一共经营了三个多月,就获纯利三万。周耀明跟他朋友商量,利润全让他朋友拿走,但把本钱留下,第二年再还本钱。他朋友同意了。周耀明又经营了一年,到1995年底决定重操旧业时,他信守诺言,把三万元本钱如数还给朋友。周耀明自己除了花掉的生活费还净赚将近五万,他朋友一年多时间连本带利共收回六万元,获利百分之一百。周耀明把开小店赚来的钱投入木业加工,一帆风顺滚动发展到现在,现在每年仅缴税就达四五十万元。

2005年4月初清明前的一天,周耀明的别墅南边,一大片油菜花已然盛开,黄灿灿的,生机勃勃。我打开数码相机正要拍照,一男子骑摩托车路过。他主动停车与我攀谈,问我是不是费孝通的人。他叫徐锡其,开弦弓村一组的,瓦工出生,是周耀明关系不错的朋友。他告诉我,周耀明从上海回来,把债主们请来,所有的债,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利息,一次还清;还完债呢,就盖房子,请了外面正规的施工队,一共花了有一百万呢!看他说话的神态,真有点替周耀明扬眉吐气的样子。

我问周建美,你们全家人口不多(盖房时全家三代五口,她的父亲2004年因患肺癌去世),为什么要盖这么大的房子?我心里猜想,他们是要用一栋全村最大的房子,来找回他们曾经失去的面子。周建美说,最初提出盖房子的是她父亲,他说,你们在上海赚了钱别人又不知道,要盖房给大家看看;但后来盖成这么大这么好是周耀明的主意。现在他们也有点后悔在盖房上花钱太多,因为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需要更多的流动资金,如果盖房少花点钱,手上多点流动资金就好了。

去了周家很多次,可要见周耀明还真不容易,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偶尔回家,我又正好不在村里。我给他打电话、发传真,想约他在上海见面谈谈,看看他的“工厂”,可他不是委婉地拒绝,就是干脆不给回复。2005年4月23日那天,我带着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一起来到开弦弓。中午时分,我们先去看了在这里打工的几个安徽女孩,她们正在吃饭,主人给她们安排的午饭是三菜一汤,菜是素的,汤里有点鸡蛋花。接着又到周耀明家,但见院子里停着一辆江苏牌照的别克轿车,我们往里走,听见厨房传出一片笑声,显然他们也看见我们了。一家四口正在吃饭,周耀明站起来,高高大大的,颇有气派,他热情地与我握手打招呼,周四宝则盛出两大碗饭



请我们一起吃饭。我看了一眼饭桌，比安徽女孩们的午餐略微丰盛点，但基本上还是普通的农家饭。我对周耀明说：“来了快十次，终于见到你了！”周耀明解释说：“我那只是一个作坊，确实没什么可看的。”话虽这么说，他还是将他上海“作坊”的地址告诉了我：莘庄，莘松路，姚泾 81 号。

5月11日，我开车从上海中心区域出发去周耀明的木业作坊。沿着向西南方向延伸的沪闵高架路，经过与外环线相交的大型莘庄立交桥，就是莘松路（莘庄至松江）。莘庄地区很美，大路两旁繁茂别致的香樟树与欧洲风格的建筑物立面和欧式广场相互映衬，形成一种跟市中心不一样的城市氛围。莘松路两旁有很多新建的漂亮别墅群，看不出这里能容下什么作坊。又走了一段，仍不见“姚泾”，只好向路边一辆警车求助，打听姚泾在哪里，警察也不清楚，说了半天不得要领。只好给周耀明打手机，经指点，继续走一公里左右就到了，就在沪杭高速的立交桥下。周耀明在电话里反复说，很简陋的，看了不要见笑。

姚泾 81 号是一个有十来栋简易厂房的大杂院，从莘松路到大门是一条百十来米长的沙石路，院内的路更是嶙峋不平，甚至令人担心扎破汽车轮胎。厂房的简陋，确实到了必须令主人先打招呼的地步。而这里距离漂亮的别墅群不过数百米距离。周耀明不在工厂，他的“娘家”大哥和厂长（一位浙江湖州人）接待了我。工厂的办公室倒还像样，坐下喝几口茶后他们陪我参观车间。车间很大，分布在第七栋和第八栋简易厂房里，里面堆着一些已经加工好的木门。有十几个工人正在加工一种与铲车配合使用的货架，仓库里堆货一般要用到这种货架，货物擦在货架上，铲车的铲子往货架底下一插，再往上一升，就能把一摞货物提起运走。这一批货架是要出口的。看来国际上需要的这类低附加值的木制品也拿到中国来加工，以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但是令外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这样简易的“作坊”里照样能产生百万富翁，能让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周四宝甚至说周耀明是文盲，不识字）施展才能，赚到钱，能在家乡盖起豪华的别墅。

后来周建美知道我去了工厂，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很简陋，是吧？”我回答她：“简陋是简陋，但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办企业嘛，就是要尽量降低成本。这些简单的木制品就因为在这样的厂房里加工才能赚到钱，厂房好一点，租金高一点，利润也许就没了。”她也不太理解为什么我那么关注周耀明如何走出家门、如何在上海这个大市场创业，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他，是不是要把他拔高树为标兵？我对她说：

“我们做调查，讲究实事求是，不是树典型，一点不拔高。开弦弓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我们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村子里的人现在在干什么，为了改善自己的生